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课题

儒学与社会现代化

主编\姜林祥\薛君度

副主编\修建军



上卷

广东教育出版社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课题

儒学与社会现代化

主编\姜林祥\薛君度

副主编\修建军

上卷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与社会现代化/姜林祥, 薛君度主编.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406-4878-3

I. 儒… II. ①姜…②薛… III. 儒家-关系-现
代化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D614②B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0591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市天河高新技术园建工路 17 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40 印张 1 000 000 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套

ISBN 7-5406-4878-3/B·27

上、下卷定价: 80.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6440

序

牟 钟 鉴

摆在我面前的《儒学与社会现代化》这部书稿，处理的是儒学研究中最新最大的课题，即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与这个课题相关的论文已经看到很多了，但是像本书那样，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蔚然大观的专著，到目前为止却是少见的。这部专著是生活在孔子故乡的曲阜师范大学的一批学者数年辛勤思考和笔耕的成果。姜林祥教授和他的朋友们身居曲阜，胸怀祖国，依托历史，面向世界和未来，长期埋头苦干，致力于儒家文化的研究。两年前，他们出版了七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初步显示了他们系统整理与总结历史文化的深厚学术功力，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如今在治史的扎实基础上，他们又推出一部以论为主的儒学现代性研究专著，进一步显示了他们博大的眼界和强烈的时代意识。这两部书都是颇有分量

的学术力作，作者互有交叉，都可视为曲阜师大人文群体的代表作，说明曲阜师大的学者群已经成长成熟起来，他们没有辜负孔圣故里的美誉和海内外人士对他们的期望，在儒学历史与现代性研究方面，他们率先走到了全国学术界的前头，这是令人敬佩的。

这部书的上卷，本着鉴古知今的精神，承接着重儒学在中国古代源流的回溯，而把重点放在对近现代社会变革中的儒学的考察，尤其着力阐发了儒学与现代建设的关系，提出一系列启人智慧、颇具创意和实用的论题和建议，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说上卷是从现代看儒学，那么下卷便是从世界看儒学。作者分别考察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乃至欧美文明以及港台地区的现代化与儒学的关系，把儒学现代性问题放在东亚和全球现代化总体进程中加以审视，总结它们的经验，回答争论的问题，针对世纪之交各种全球性危机的挑战，运用儒学的精义予以积极的回应，推动儒学走向世界，让儒学为社会现代化服务，为人类造福。由此可知，作者对儒学现代性的研究评说，并不是凭空臆说、逻辑推演，而是依凭实在的历史，分析实在的经验，根据实在的需求来进行的，所以也就实在可信，有着很强的说服力。当然，这是一家之言，既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每说必当，需要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但我赞赏作者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我认为在这方面作者代表着一种新的健康的学术潮流。

从儒学研究的近现代历史看，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研究态度与方法大约有三种：一种是历史主义指导下的还原方法；一种是启蒙心态影响下的批判方法；一种是意识形态支配下的阶级和路线分析方法。

历史主义指导下的还原方法着重研究儒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以还其本来面貌为追求的目标，因此不能不强调儒学的时代性和不同时期的具体形态与社会影响。这是一种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儒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其优点是将儒学纳入确定的时空构架之中，揭示儒学真实的历史，形成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这种方法至今人们

仍沿用不辍。但这种方法也有不足之处，容易模糊儒学的超时代性和普遍意义，同时缺乏与儒家思想的心灵对话与沟通，把儒学仅仅看成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与历史陈迹，难以全面估量儒学的价值。

启蒙心态影响下的批判方法，着重研究儒学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全力攻击儒学的“三纲说”所代表的君权、夫权和父权，提倡近代民主、自由、平等诸精神，为打破宗法等级社会、建立现代公民社会鸣锣开道。晚清和五四以来进步思想家发动的反孔批儒运动及其理论成果，都是这种批判方法的产物，都属于新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这种带有思想革命性质的批判，有时是很必要和很深刻的，它使人认识到旧礼教的危害性和反人性，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功绩；对于儒学本身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促使儒家作自我反省，清除僵化陈旧的成分，显现精华的内容。但是这种批判方法往往良莠不分、矫枉过正、以偏概全、重破轻立，否定有余而建设不足，不可能不伤及民族文化生命的根基。而且在革命、进步的热情下传播一种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容易抓住人心，却很难加以纠正。由于精华也往往被当作糟粕予以抛弃，文化缺少了自身生机的培植，其结果是真正封建性的糟粕却因受不到有效的抵制反而泛滥起来，或者改头换面依然流行，这是文化激进派所始料不及的。

1949年以后，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对文化遗产有“批判的继承”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针原则，但在实际研究中推行的却往往是意识形态支配下的阶级和路线分析方法，是“左”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对儒家人物和思想学派，强调阶级归属和思想路线，而忽视其丰富的人文智慧。这样一来，对儒家学说肯定的不多，否定的不少，孔子和儒学基本上是一种反面的消极的形象。对儒学的研究，假如是遵循真正的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便会产生积极的意义和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左”的思潮日甚一日，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所谓阶级原则出发，使研究方法单一化和政治化，儒学研究逐渐脱离正常的学术轨道，而为政治运动所扭曲。与五四运动不同，“文化大革命”把

本来就偏激的儒学批判工作变成反理性反社会的狂热运动,变成政治阴谋利用下的影射史学。“文革”中的反孔批儒运动,其主要矛头指向儒学的人文精华,即仁爱中和之道,同时宣扬法家的专制主义思想,从而暴露了这场运动的危害性,同时也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真正的封建遗毒并不一定总在儒家文化体系里,也会藏身在反儒的社会运动中。“文革”的失败,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失败,对儒学研究来说,它宣告了数十年来反孔批儒的时代的结束,开始了一个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有些是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对待儒学的态度和研究方法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由于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学者的视野开阔了;个性得到舒展,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学术观点的百家争鸣已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而人们的意识又往往落后于存在,五四情结、阶级斗争情结仍以其习惯的力量保留在部分人的心里。于是多元交渗和新旧交替就成了最近二十年来儒学研究的特色之一。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时代背景的变化对儒学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而促使更多的人对新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形成一种高度的自觉性。

20世纪的国内外形势,8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以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社会革命(各种形态的)风起云涌和政治集团及意识形态剧烈对抗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的民族独立运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及二战后两大阵营的长期对立,使这个时代充满了社会动荡和人际紧张。于是斗争哲学便成为最受欢迎的行为指导原则,人们的感受是: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才是一种最真实的存在,似乎别无选择。在这样一个不是热战便是冷战的年代里,具有和平性格、具有稳定社会人生功能的儒学自然要受到冷落和贬低。

80年代以来情势大变,冷战思维已没有大市场了,意识形态退居次要地位。欧美发达国家通过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繁荣;一系列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亚通过社会改革与

和平发展，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与社会进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由于摆脱了内部政治运动的困扰和在外外部方面减轻了与西方的隔膜或对抗的压力，实行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路线政策，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于是，和平压倒了战争，建设取代了破坏，人类迎来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时代。当然，战争与对抗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发展与混乱并存，希望与危机同在，斗争哲学和各种旧有的思维模式仍然有它们的市场，但是不可否认，时代的主调确实改变了。这是一场有别于以往的新的竞争，谁的社会发展最快，谁的国际互动最好，谁就最有条件赢得胜利。竞争的新态势是由政治而经济，由经济而文化；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蕴和最具草根性的持续力支撑着政治和经济，显示出无穷的潜力。

在这种时代氛围里，建设成为最强音；文化的积累，包括本国的和外国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无不被建设者视为可供开发运用的重要资源，受到高度重视。这个时代也充分暴露了已有的工业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弊害，因而把文明转型的紧迫任务提到人类面前。以“全球价值”面目主导世界数百年之久的西方近现代价值体系发生动摇。于是出现三种现象：一是全球性的现代文化向古典传统回归，其实质是用根源性的纯朴的传统调整现代化过程中的偏差；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随着东亚的崛起而提高了地位，扩大了影响，从而推动了东西文化互补交流的进程；三是民族文化意识普遍高涨，超过了阶级意识，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有利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有着深厚积累，包含着许多社会人生常道，表现人类早期健康理性，带有鲜明东方特色的儒家文化，必然会得到中国和东亚人的重新评价，也逐渐受到西方有识之士的特别关注。人们发现，儒学“天人一体”的宇宙观，“仁爱忠恕”的人际观，“成己成物”的人生观，“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敬业乐群”的职业观，

“启发心智”的教育观，“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等等，对于克服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人文大智慧，具有极强的治世价值与功用。找回蒙尘已久的文化珍宝，让它重新放射光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资源之丰富程度举世罕见，利用这些资源建设新的现代文化大国是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时代需要儒学，它为儒学的发展利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今天，儒学的研究，除了已有的传统模式，还出现了现代化过程中资源开发式的建设性的推陈出新的模式。“推陈出新”原来是戏曲艺术界流行的口号，现在已扩大运用到一切传统文化研究上来。“推陈出新”不是“弃陈造新”，而是从旧有的文化中提炼转化出新颖的文化，这就是文化上辩证的否定。因此，这种研究模式着眼于儒学正面价值的发掘熔冶，力求把传统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回答和解决当代人们关心的种种现实问题。

概括地说，“推陈出新”方针有如下特色。第一，它超越了一般史学方法所看重的时空框架，着力研究儒学中超时代、超地域的普遍性价值，凡有利于当代社会健康发展者皆弘扬之，否则便抛弃之；第二，它以立为主，不以破为主，破是为了更好地立，化古慧为今智，化腐朽为神奇，不挑剔前人的不足，而在意于今人的更好；第三，它顾后是为了瞻前，站在时代前面，为现代化建设寻找源头活水，增添精神动力，使之根基厚实，能持续和稳定发展；第四，它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把儒学放在世界多样文化共存和互释、交渗的大局中考察，从而使儒学研究不但与现代化进程相一致，也与儒学自身的世界化过程相联系。用世界的眼光看儒学，更能显示它的现代性。可以说，儒学如不能走向世界，亦不能走向现代和未来，反之亦然。我以为《儒学与社会现代化》这本书，就是作者在新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在社会最新需求的推动下，运用建设性的推陈出新的方法研究儒学所取得的优秀学术成果，它是贡献给当代社会的一份厚礼。

文化是内层的，政治、经济等是显层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民

族的文化生命如不能健全和畅通，那么它所进行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也往往会流于偏狭、浮躁、极端，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人们常说中华民族多灾多难，除了外部的侵略，内部的祸患亦属不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非常艰辛。中国百余年来，社会改革运动不可谓不多，然而付出很多，成绩却不够理想，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文化问题没有解决好。具体地说，就是在很长时期内主导社会潮流的人们不能正确处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要么封闭固陋，因循守旧，不思革新；要么数典忘祖，全盘西化，模仿照搬；要么形式上激进，而实质上倒退，始终难以作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抉择。旧的文化传统形态过时了，而新的文化传统即真正体现优良历史传统与先进外国文化相结合的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风貌的新文化体系迟迟不能建立。信仰失去重心，道德陷于混乱，文化呈现庞杂，政治和经济改革便因此而弊病丛生，常常是走两步退一步，有时甚至走一步退两步。“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深处却是文化激进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这就是政治上的大倒退大混乱、经济上的大破坏和近于崩溃。这又一次从反面证明了文化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的内在联系，文化问题处理错了，政治经济便不可能顺利发展。中国人经历了如此众多的苦难和挫折，如今应当在反省总结的基础上变得成熟稳健起来，在发展经济、改革政治的同时，要下大力气从事新文化建设，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国家的复兴必须伴以文化的复兴。在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应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汲取西方优秀文化的营养，形成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新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要条件。从这一角度审视问题，便知儒学现代性研究不仅仅是为新文化建设工程提供思想营养，更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基础建设。因为儒家文化就其一般意义而言，从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轴心和基础，而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新文化建设的基础，那么儒家文化的开发和激活，便当然是新文

化建设中基础的基础了。儒学现代性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在这里。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自己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就在于它有着伟大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文化的精神凝聚着整个民族,培育着它的人民和精英,造就了它辉煌的过去,并且正在造就着它伟大的现在和未来。儒家文化在涵养中华精神、锤炼民族性格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研究儒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扬伟大的中华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增添活力。按照北京大学张岱年先生的说法,中华精神有两个侧面:从力度上说,便是自强不息;从宽度上说,便是厚德载物,而这两个方面都与儒家传统密切相关。由此可知,中华精神的发扬,儒学精华的传播,既有益于中国的振兴,又有益于世界的和平。它是民族的,但不是狭隘的;它是世界的,但保持着东方的风格。

如今,儒学的现代性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它的成果已经走进了现实生活。在道德建设和工商文明两个方面上,儒学资源被广泛开发运用,取得可观的成绩。在世界和平与社会和谐的问题上,儒学资源已被用来参与世界战略性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讨论与治理。可以预料,儒学文化的精粹在21世纪将会得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广阔的开展和发扬,参与儒学研究和应用的人们会越来越多,接纳儒家智慧的领域会越来越广泛。在这样一场普遍而又深刻的文化运动中,中国应该率先作出榜样。

2004年7月于北京

上卷目录

序·····	1
导 言·····	1
第一章 儒学在古代中国 ·····	16
第一节 先秦儒学·····	17
第二节 董仲舒与儒学独尊的确立·····	44
第三节 宋明理学·····	60
第四节 明清实学·····	94
第二章 洋务运动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127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	128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 回应·····	136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今文经学派的经世致用 ·····	147
第四节 洋务运动的纲领——“中体西用”论 ·····	177

第五节	“中体西用”论的历史作用及其评价	212
第三章	戊戌变法与儒学的现代转换	223
第一节	维新变法的兴起与今文经学	224
第二节	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	238
第三节	康有为的儒学与晚清政治文化	270
第四节	戊戌维新运动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作用	290
第五节	戊戌变法失败的历史反思	304
第四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311
第一节	辛亥革命与帝制复辟	312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	334
第三节	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	353
第四节	“东方文化论”与儒学	372
第五章	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论争与儒学	395
第一节	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	395
第二节	“全盘西化”论与儒学	410
第三节	“中国本位文化”论与儒学	430
第四节	“民族的科学的的大众的文化”论与儒学	444
第六章	改革开放与儒学研究的新热潮	465
第一节	“文革”时期的儒学	465
第二节	儒学研究新热潮的兴起	484
第三节	新时期的文化论争与儒学	499

第七章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518
第一节 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 的和谐及稳定发展	521
第二节 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 的精神文明建设	542
第三节 儒家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管理	563
第四节 儒家的教育思想与现代社会教育	584
第五节 儒学与现代儒商精神	605

导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的“儒学热”，已引起了世界各国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学与现代建设的关系以及儒学在 21 世纪的地位与影响，成为人们所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因此，站在世界大趋势和人类社会历史走向的高度，继续深入挖掘儒学的精华，并使之发扬光大，对中国及世界文明建设，必将产生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儒学在近现代中国

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 109 年，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的过渡社会形态，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与变革，传统儒学也经历了一个由衰落、正统地位的丧失向近代转换的过程。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输入，冲击了传统儒学，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足以“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学失去了“夷夏之大防”的效用。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西方文化的挑战，回避与退缩都无补于事，中国人必须睁开双眼看待自己和世界已成为不可逃避的民族课题。因此鸦片战争后的儒学，与以前相比，呈现了许多新的特色。

首先，儒学各派都趋向于经世致用，以适应时代变局。中国近代之初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和魏源，从自强出发，提倡“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主张“更法改图”、改革弊政。到了清光绪年间，维新派康有为等人，以“托古改制”作为变法的指导思想。他们主张“以复古为解放”，从“复古”中寻求解放，经过“托古”以达到改制的目的。他们遵循着一条“返本开新”的思想路线，追求的是忧患意识、变通精神、行健不息、民本思想等等中华文化的原创性精神。其次，以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和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武器。龚自珍、魏源认为，要拯救民族危亡、匡正社会而致力于国家富强，必须有世变事迁、历史发展的眼光。洋务派利用变易的观念解释洋务运动时期的“变局”，同时利用因时变通的观念说明洋务措施顺应世变、合乎天道。戊戌维新派则将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与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糅合在一起，为自己的变法的合理性作理论上的论证。康有为提出的“公羊三世历史进化论”，标志着从古代变易史观到近代进化论史观转变的完成。再次，儒学与西学调和会通，是晚清儒学的一个突出特色，魏源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洋务派归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通过在儒学与西学会通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仍然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如何自强、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等问题而展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意义在于：结束了儒学在政治、伦理道德领域的统治地位；中西文化进一步融合，为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开辟了道路。

从 1919 年至 1949 年的 30 年间，西学比之五四前以规模大且全面系统的新特点向中国输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这一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四大文化思潮，即实证主义、新儒学、官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这四个派别虽然都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但他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态度，却存有明显的差别。

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派，则是从实用主义出发，来重新评价传统儒学，以寻求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他的特点是：其一，运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突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经学和经学史的樊篱，把孔子放到与其他诸子并列的地位进行评述。其二，胡适把西方实用主义方法与乾嘉朴学方法相沟通，提出了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有重大影响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新儒学的产生，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孔批儒的一种保守的回应。它是以继承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学术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他们各自建立的思想体系虽有所不同，但对后代，特别对第二代、第三代新儒家，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所谓官方哲学，是指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党官方思想。他们都是以弘扬孙中山哲学的面目出现，编织了一套孔孙道统论，把孙中山说成是继承和发扬孔子之道的“集大成者”和“继往开来的大圣”。从形式上看，他们是立足于东方文明，形式主义的谈论东西文明的异同优劣，归于复活儒家传统哲学。但实质上，他们则是把西方的唯意志论和法西斯主义与传统儒学的某些方面“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反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官方统治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按时代发展的方向和民族现实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系统地解决了如何对待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首先，在理论上，毛泽东提出